

西方传染病史研究中的『污名化』

□施 诚

一，俄国考古学家在伊塞克湖发掘了许多墓地，其中有些死者被认为是1338年患黑死病死亡。第二，中亚的旱獭被感染了鼠疫病菌的跳蚤叮咬，当地猎人把这种旱獭的毛皮出售给商人，商人向西沿途出售这种旱獭毛皮，因此鼠疫病菌也随之一路向西传播。第三，14世纪初，中亚地区发生的重大环境变化导致啮齿类动物食物缺乏，于是携带了鼠疫病菌的啮齿类动物迁徙到中亚有人居住的城乡，这一迁徙过程为鼠疫传播提供了机会。

西方学术界有人认为中国是14世纪黑死病的发源地。比如，研究世界自然灾害史的威廷顿就强调中亚旱獭和跳蚤传播了黑死病，但是他的论证非常离奇：“中亚伊塞克湖附近的啮齿类动物旱獭携带感染了鼠疫杆菌的跳蚤，从陆路或水路离开老家，在谷物、羊毛或布匹身上生存几个星期，并把病菌传播到家鼠身上。这些家鼠和跳蚤是伟大的旅行家，它们一旦与人类紧密接触，就会把鼠疫传播给人类……1334年，鼠疫在中国暴发，死亡人数可能达到500万。然后鼠疫沿着商路向西传播。”威廷顿的观点显然站不住脚，难道从中亚出来的老鼠和跳蚤有方向意识，先向东“旅行”万里，直奔中国，然后再折返回来，向西传播？正如医学史专家诺里斯所言：“任何关于中国起源和中国鼠疫的证据都是微不足道和不足为信的。”

梅毒的起源地

1495年7月，入侵意大利的法国军队暴发了一种新型的严重疾病，后来知道它就是梅毒。梅毒以惊人的速度传遍欧洲。由于当时欧洲人不知它的起源地，加上它是由不道德行为引起的，所以它通常用敌人或敌国来命名。法国称之为“那不勒斯病”，那不勒斯称之为“威尼斯病”。后来意大利人称之为“法国病”和“西班牙病”，西班牙人则称之为“德国病”，俄国人称之为“波兰病”。

关于梅毒的起源地，现代学者主要有3种观点。第一，起源于美洲。第二，起源于欧洲。第三，由非洲奴隶带到欧洲。这种观点称，非洲人常患“雅司病”，随着葡萄牙西班牙把非洲奴隶运到欧洲，非洲的梅毒也就传染给欧洲。可是，在古代非洲奴隶就进入过欧洲，那为什么古代欧洲没有暴发过非洲人传染的梅毒呢？所以，这种观点显然是偏见。

美洲天花病的来源

16—18世纪，每隔十几年，美洲就会暴发一次大规模天花病，感染者死亡率达到30%，导致美洲许多地区的印第安人人口长期下降。美洲长期与旧大陆分离，没有旧大陆长期存在的天花病，因此人们缺乏对它的免疫力。

那么是谁把天花带到美洲的？有学者认为，是非洲奴隶于16世纪初把天花传播到美洲。根据史料记载，1507年，天花在加勒比海地区的伊斯帕尼奥拉岛上首次暴发。西班牙国王授权美洲殖民地输入4000名非洲奴隶之后不久，第一批非洲奴隶于1518年被贩卖到美洲，当年12月，天花才在伊斯帕尼奥拉岛上又一次暴发，这次的暴发人群集中在非洲奴隶

们身上。显然，该岛上流行天花病在先，非洲奴隶登陆该岛在后，因此，把美洲天花病的暴发归咎于非洲奴隶是错误的。现在大多数学者认为，天花是由西班牙殖民者传入美洲的。

1918年大流感的起源地

与其他重大传染病研究一样，1918年大流感的最大争论之一也是它的起源地。一战期间，西班牙作为中立国，新闻不受审查，国王、首相和内阁成员染上流感的消息不见诸报端，其他国家则不断转引。不到一年，西班牙染病死亡人数就达到26万多。因此，流感很快就被称为“西班牙大流感”。西班牙对这种“污名化”做法非常气愤，坚称大流感来自法国，因为“大批法国游客正好此时来到西班牙”。

现在绝大多数研究1918年大流感的学者认为，“西班牙大流感”并非起源于西班牙。那么它究竟起源于哪里呢？由于流感暴发于法国前线，而且士兵染病情况记录很完整，所以最初人们认为法国军营是流感起源地。当时美国有些医生对国内民众说，“德国已经开始暴发流感，他们派遣特务乘坐潜艇，登陆美国，释放病菌”，意思是美国的大流感是德国发动的细菌战的一部分。但是，现在学者们一般都否认这是细菌战。

当欧洲的法国、英国和德国都被否认1918年大流感的起源地之后，一些西方国家和学者开始把矛头指向中国。一战期间，英国和法国政府在中国华北地区招募约14万华工赴欧洲战场，帮助协约国作战。作为攻击协约国的战争宣传手段，德国最早指责中国劳工把流感带到欧洲。如通过研究英国档案馆中赴欧华工的招募和运输资料，英国史学家朗福德认为，1918年大流感也传播到中国，但是中国死亡率比较低，因为流感病毒起源于中国，大多数中国人获得了免疫力，而正是这些具备免疫力的华工把流感病毒带到了欧洲。

美国科学家艾德温·乔丹带领一个医学团队进行了长达10年的研究，于1927年出版了《流行性感冒》一书，书中否认中国是大流感的起源地。正如长期研究一战时期中国赴欧劳工问题的香港大学徐国琦教授说的，“迄今为止，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表明中国劳工把流感病毒带到欧洲……事实上，迄今为止，任何人都不能确定1918年流感如何开始、来自哪里”。

实际上，大多数学者认为，美国最有可能是1918年大流感的起源地。艾德温·乔丹认为，美国堪萨斯州比较封闭的哈斯克爾县就是1918年大流感的起源地，因为它有最早的流感记录，而且无法找到其他地方传入它的记录。哈斯克爾县的流感首先传播到附近的芬斯顿新兵训练营，驻扎该军营的美国士兵赴欧作战时，把流感带到了欧洲战场。

从以上4种重大传染病历史研究来看，一直存在把疾病和起源地“污名化”的倾向。如果西方学者秉持公正的态度、科学的方法研究传染病的起源地，那么见仁见智的观点就是正常学术的研究；但是如果研究者在没有确凿史料情况下，把历史上一些重大传染病的起源地指向亚非拉地区和国家，那么很可能是他们的偏见和成见在作祟，这是历史研究的大忌。

茶叶传播的历史

□曹颖新 盛舒洋

无论是煎茶还是点茶，从压茶的制作过程到饮茶的调配过程，在今人看来，都显得过于繁琐。那么今天用芽叶冲泡的方式是何时形成的呢？是明代。14世纪中期，茶叶制作工艺发展出炒青技术。炒青的茶叶，不但比制作饼茶的浸水、蒸干等工艺省时省力，还能更大限度保留茶叶天然的滋味。而明代人的心理更倾向于内观，审美上偏好去除雕饰、保留天然。只经过简单处理的鲜嫩芽叶，直接冲泡后只喝萃取后的茶液，正好符合明朝人的心理偏好，所以，像西湖龙井、洞庭碧螺之类的品种开始大受欢迎。

唐代盛行煎茶，宋代盛行点茶，明代盛行泡茶。各个时期不同的饮茶方式，反映了各自的时代风貌。唐代具有青春气象，中华民族还在融汇形成过程中，并没有产生固化的“自有”“外来”的概念。一位身居长安的中产者，他可能穿着龟兹国样式的翻领对襟服，吃着来自康国撒马尔罕的金桃，住着产自南亚沉香木建的房子，骑着来自突厥的良马出行。一切异域的东西都可能转化为大唐的，喝茶也是如此。当时用来煮茶用的茶釜，是一种无盖、敞口的大锅，明显带着北方和西域的豪放之气，加盐、姜一锅烩的茶汤，可以说是“胡汉一家”时代特征的写照。再看宋代，其饮茶文化发展到了高峰，茶品之繁复、茶具之精致、茶论之精到，都比唐朝又上了一个台阶，就连其流风余韵，都通过荣西禅师间接影响到日本，把日本的饮茶生活推到了形而上的高度。宋代著名的饼茶“龙团”，体现了这个时代精细典雅的精神内蕴。

宗六祖慧能去世，他开创的顿悟方式在他生前还不普及。在他生活的时期甚至更早，也就是开元之前，禅宗渐成大宗，禅修的主流方式是静思渐悟，枯坐之时，不能吃晚餐，只能吃茶，还要保持头脑清醒，于是茶成了禅修的必备之物。禅宗推崇的修心觉悟之法，吸引了士大夫的注意，与之伴随的饮茶生活方式也影响了居于长安、洛阳等地北方人的世俗生活。虽然此时饮茶已蔚然成风，但是要把它发展成一种集日常性、共享性、传承性为一体的文化行为，是需要在全民接受的基础上，由精于此道的人对其进行研究、阐释、生发才能实现的，这时，陆羽的《茶经》应运而生。《茶经》使茶脱离了吃吃喝喝的俗境，上升为富有独特内涵的文化载体。

到了宋代，茶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饮，上至王公贵胄，下至贩夫走卒，人人都能从这种饮料里获得满足。唐代流行煎煮饼茶，就是把鲜叶蒸熟后捣碎，压制成饼，喝的时候取块碾碎，筛制成末，再佐以配料，煮成茶汤，不过滤而饮之。宋代则流行点茶，与唐代方式不同的是，碾筛之后的茶末，不再放入锅中煎煮，而是放入杯盏中，用沸水调注，并用茶筴不断搅动白色的茶汤，再把茶汤倒入黑釉茶盏中，以凸显茶汤之白。

元代延续了宋代喝抹茶的习惯。虽然蒙古人喜欢喝奶茶、油茶，但是蒙元时代的人们饮茶方式十分多元：王公贵族喜欢喝砖茶；像耶律楚材、赵孟頫这样的才子，更加倾心于江南的清淡之风；另外，民间还有在茶中加入花朵、果干等辅料的喜好。

东汉政权是如何走向衰亡的（下）

□吴小乔

历代王朝中，卖官鬻爵现象并不鲜见，但在汉灵帝时期，卖官鬻爵的严重程度可以说无人能及。

汉灵帝刘宏即位数年后，已无外戚掣肘，宦官虽然无道，却都听命于他。于是，刘宏开始玩兴大发。他开设西邸官职交易所，明码标价，“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官市一开，便有人到官门上书，指定要买某某官职。刘宏便根据每个县的大小、贫富等情况，明码标出各官职价格。对于有钱的富人，要求交现金才能买到手。对于钱少之人，则可以先赊账，但要付利息，等他到任后，要按照原来的定价加倍偿还。刘宏公开卖官还不过瘾，还私下让左右的人也卖，连三公九卿这样的柱国重臣职位也卖，“公千万，卿五百万”。

刘宏还很有家庭理财观念，搞公私分营。他专门在皇宫西园设立一个钱库，贮藏卖官所得，当然，这不是国库，而是他的私房钱。史书分析，这是因为灵帝当初为侯的时候，经常苦于家境贫困。等到当了皇帝之后，每每叹息桓帝不懂得家产经营，没有私房钱可用，“故卖官聚钱以为私藏”。其实这种行为与少时贫穷无关，而是与其人品品质相关。贫穷只是凸显了这种品质而已。

刘宏很自得于自己的卖官生意，有一次便问侍中杨奇，我和桓帝相比如何？杨奇的回答柔中带刺：陛下和桓帝相比，犹如舜和尧相比一样。意思是差不多，可能还要略差一点。灵帝自以为比桓帝高明不少，至少是在卖官敛财作私房钱上。听杨奇这么一说，就很不高兴地说，你可真是个犟脖子，不愧是杨震的子孙，死后一定会再次引来大鸟。

官市一开，人才选拔途径便切断了。不管你有没有才能、政绩、声誉，统统交钱才能为官。当时像段熲、张温这样“功勤名誉”的人，也都要先交钱，才能登上三公之位。而且三公之位，还只有通过宦官或刘宏的乳母向西园交钱后才能得到。当时廷尉崔烈通过刘宏的乳母程夫人交了五百万钱，才当上了司徒。在正式任命的那一天，灵帝亲自主持仪式，文武百官都来参会，崔烈难免意气风发，春风拂面。灵帝见他这个样子，便心生后悔，对左右的亲信说：“悔不小新，可至千万！”程夫人一听，在旁边回应道：“崔公，冀州名士，岂肯买官！赖我得上，反不知嫌耶！”她的意思是，崔烈是名士，不肯买，要不是我从中斡旋，做足了他的思想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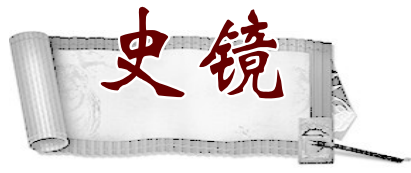
他才肯出这么多，您还不满意么？崔烈买官的事一公开，其声誉便大跌，“铜臭”典故由此而来。当时，他自己也觉得不踏实，便问其子崔钧，大家有什么议论。崔钧实话实说，大家认为你少有英名，历任多职，应当为三公，但登上三公之位后，天下便失望了。崔烈问为什么？崔钧说“论者嫌其铜臭”。把崔烈气个半死，举起拐杖就要打他，崔钧当时是虎贲中郎将，身手敏捷，迅速逃走。

从史书记载来看，当时买官花钱最多的，应该是曹操的父亲曹嵩，一共花了“一亿万”，即史载“嵩灵帝时货赂中官及输西园钱一亿万，故位至太尉”。

所有官职，无论大小全靠钱来买，官僚集团便只会更加腐败，别无他路。即便如段熲、张温、崔烈等还能干点正事的功臣名士，至少也要捞够本才有活路，更何况那些本就以发财为目标的人。官僚集团腐败，最终便是底层百姓遭殃，一旦疯狂搜刮让百姓没有活路，就只好起来造反了。在政权倾颓的各种因素中，卖官鬻爵无疑是让政权地基腐烂最快的一个因子。

读这段历史，感觉灵帝不当商人真是可惜。他无心政事，却很有点经商欲望，把后宫建成了商品交易所，时时过瘾。比如，他在后宫建了很多店铺，让宫女们卖货，他自己则穿着商人服装，和行商的宫女们饮宴为乐。灵帝还很喜欢动物，他在西园玩狗，给狗穿上文官服饰、官帽。还驾着四头驴拉的车子，在园子里来回乱跑，甚至因此而引领风尚，洛阳豪门竞相效仿，以致驴价与马价相等。他要求天下的奇珍异宝、各国贡品，都要挑一部分给私人财物库“中署”，美其名曰“导行费”。而这笔导行费，是正常税赋之外的，也就加重了百姓负担。

公元189年，汉灵帝终于在醉生梦死中死了。13岁的刘辩即位不久即被废，后来14岁的汉献帝刘协即位，是为东汉的末帝，虽然延续到东汉正式灭亡，但东汉的国运就再也由不得他了。



被消费主义重新定义的茶

从15世纪末开始，随着航海路线的开发，陆地和岛屿空前地连接在一起，这一进程的先行者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与此进程相伴随的，是资本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生产至流通的全过程中。这一进程的主导者，则是拥有海上控制权的后起之秀荷兰和英国。兴起于西欧的工业革命，使两国产能迅速增长，国内需求扩大，消费能力提升，资本极大积累。资产阶级通过国家通过各种手段为资本寻求出口、实现增长，包括国内工业革命、海外殖民、建立国家授权的垄断贸易公司等，都是有效的手段。荷兰东印度公司和东不列颠东印度公司，都是资本推动的乾坤大挪移中的前台角色。继香料、棉布、蔗糖、烟草贸易之后，茶叶贸易也纳入到以逐利为目的的全球流通系统中。

在这一进程中，茶叶被英国人不断推崇，直至被奉为国饮。表面上看，是凯瑟琳王后带动了英格兰的饮茶风尚、贝德福公爵夫人推动了英式下午茶运动，其实，是资本这个推手加速了茶叶贸易、重构了供需市场、塑造了消费革命，使茶叶由奢侈品变成必需品。在经济竞争中，英国击败了欧洲的诸多老对手，建立了能够控制各大洲贸易的商业帝国。在经济冲击下，政治版图中，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印度莫卧儿帝国、中华大清国，这些传统的靠政治垄断财富的帝国，面对这个甚至不以国别为边界的资本帝国，都纷纷败下阵来。近代的茶叶贸易，是殖民主义时代不同政治经济模式碰撞的缩影。

